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说苑全译

〔汉〕刘 向 著 王 镆 王天海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曹维琼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薛楠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阳市友谊路186号

电话：623202

说苑全译

〔汉〕刘向 原著 王 镔 王天海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9印张 722千字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ISBN 7-221-02653-X/I·305 定价：（精）17.00元
（平）14.00元

50

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1年——1995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 (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前言

《说苑》是刘向辑录西汉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加以选择、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

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他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汉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由于屡用阴阳五行推论时政得失，弹劾宦官与外戚专权误国，曾两度被捕下狱，并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刘向重新得到任用，先为护左都水使，旋升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领头校理皇家收藏的典籍），后来又曾担任中垒校尉。由于他总是站在刘氏宗室的立场上，坚持儒家“任贤选能”的主张，反对外戚、宦官秉政，所以一直受这两类当权者的排挤，很少升迁，晚年主要从事典籍的校勘整理工作。

在西汉末叶，刘向是继董仲舒和司马迁之后的一位大学者，一位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自幼修身正行，好学深思，二十岁时便识见通达，长于属文，曾与王褒等一道献赋数十篇。他一生“为人简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①。刘向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是他领导并亲自参与了对秦汉古籍的全面整理，由此奠定了我国校勘学、目录学的基础。他在长期校理古籍的工作中，吸收前代学者的经验，摸索出一套相当完整又比较科学的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概括说来，这就是广罗版本、比较异同、校正讹脱、删除重复、编定目次、条别篇章，然后缮写成册。缮写的书册又分两种：初步校正本写在竹简

上,称为“杀青书”^②,以备再作修改;最后的定本写在素帛上,进呈皇帝。每一种书进呈时都撰有一篇叙录。这是关于该书校理工作的详细汇报,也是一篇比较全面的书目提要,大致包括书名篇目、校勘经过、著者生平、著述原委、书篇真伪、内容是非、学术源流等项。当校理工作告一段落,他又将每种书的叙录集中起来,编成《别录》二十卷。西汉承秦火之后,古籍散佚很多,搜求、整理工作异常繁剧,刘向生前未能全部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去世后,少子刘歆继承父业,并在《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七卷。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别录》和《七略》不久即已散佚,未能流传下来^③。不过所幸的是,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照抄《七略》,从中还可窥见向、歆父子著述的大概。刘向的著作除《别录》之外,还有《疾谬》、《摘要》、《世颂》、《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世说》等九种六十七篇,另有《说老子》四篇,赋三十三篇^④,但流传至今的仅《新序》、《说苑》、《列女传》三种而已^⑤。还有一部文言神怪小说《列仙传》,旧题为刘向撰,但一般认为出自汉魏方士的伪托。

《说苑》今传本二十卷^⑥,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在每一标目之下,作者集中纂辑了先秦至汉初有关的遗文轶事若干则。一般以第一则或前数则为一卷的大纲,杂引前人言论陈说本卷主旨,以下使用大量历史上的实例加以证明。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从现存典籍中找到。

关于《说苑》这部书的类属,《文心雕龙·诸子篇》认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至于此书的学术源流和倾向,除《宋史·艺文志》将它划入子部杂家以外,《汉书·艺文志》以下

的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都归在子部儒家。从作者刘向所处的时代和他一生的行事与著述看,他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观点无疑是属于正统儒家的。不过《说苑》收录的材料却不限于儒门的一家之言,而是“兼综九流,牢笼百家”^⑦,只要能说明问题,即便“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也在所不避。书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与作者的撰述目的有关,因为他是“以著述当谏书”^⑧,陈古事以讽今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的思想潮流、学术大势使作者不得不然。

在秦汉之际,为适应封建地主阶级统一的需要,各种上层建筑都在发生变化,各家学派的思想观点、理论方法和政治主张自然也不例外。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家之言,被认为是“好是古非今”,“迂阔而不适时宜”的空头理论,孔丘、孟轲等儒家代表人物游说诸侯,经常受到冷遇。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这个学派也不能不与世推移,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巩固新建立的封建秩序、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上,以求得理论能切合实用。成书于秦末汉初后来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内有《大学》一篇,它的作者曾提出一套“三纲”、“八目”的政治理论^⑨。这套理论仍以孔孟的“仁政”学说为核心,但强调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和彼此的密切关系,认为必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新人,才能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汉武帝重用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汉初各学派争强斗胜相持不下的局面,在学术思想上也进行了统一。董仲舒对他以前的原始儒学作了巨大的加工改造,他把儒家与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以至原来儒家内部孟、荀两个支派通通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了最适合西汉政治需要的一套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这就是被称为新儒学的今文经学。

刘向作为一位生当西汉末叶的儒门学者,正是在这种新儒学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他编撰的《说苑》中,常常援引其他各派的学说主张,收录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事迹,也

是毫不足怪的。这并不像曾巩指责的那样,存在所谓内容不纯、取舍失当的问题^⑩,因为贯穿全书的思想主轴仍然是孔孟之道。刘向同《大学》的作者一样,也认为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至为密切。因此《说苑》在开头两卷首先树起一批圣君贤臣的样版,陈述他们用来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以下各卷便主要是从修身的各个方面反复说明应该如何去实现他们悬示的目标,即使专论外交和军事的《奉使》、《指武》两卷也不例外。在作者的心目中,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他应该具有仁爱而博大的胸怀,能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他应该谦恭有礼,谨言慎行,虚心纳谏,严于责己;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够知人善任,居安思危,在臣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一位贤臣,则应该具有忠君爱国、清廉节俭、正直不阿的品质,能够见微知著、防患未然,遇事尽心竭力,功成不居,在关键时刻敢于犯颜直谏。这样两类理想的统治人才需要花力气去培养。培养也无非是抓住修身这个主要环节,自幼严加教诲,为未来的接班人选明师、择良友,养成他们勤奋好学的习惯。然后用“礼义廉信忠孝勇”这些封建道德规范特别是“孝”的规范去教导他们,使他们时刻用这些规范来检点约束自己,做到慎终如始,即便在闲居独处时也不放任松懈。照作者看来,如果当权的统治层都确实具备了以上的修养和才干,那就为太平治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至于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办法,作者展示给人们的仍不外是儒家的“仁政”和“德治”。在《政理》一卷中,作者指出政治按不同的品级可分三种,即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国之政,其中以王者之政品级最高。这种政治提倡对百姓以教化为主,反对严刑峻法、不教而诛,但也不废除刑法,因为“德”和“刑”是治国的“二机”,缺一不可。这种政治要求国君崇俭抑奢、轻徭薄赋、任贤去佞,颁布的法令要宽缓而稳定;要求官吏秉公执法、清廉自守。这样,百姓能够饱食暖衣、安居乐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便有了希望。在君臣关系方面,这种政治要求国君能兼听独断,尊贤下士,信赏必罚;臣下则应感恩图

报，尽心尽职，为君为国不惜献出一切。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西汉后期却成为时髦。对于这种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新说，刘向也是笃信不疑并竭力加以鼓吹的。《汉书》本传里收录了他给皇帝的五封奏章，没有一封不是从阴阳灾祥立论的。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就会产生“和气”；反之，就产生“乖气”。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⑩。他的《洪范五行传》就是“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符瑞灾异”的专书。《说苑》的《君道》、《辨异》等卷也集中记述了这方面的事例。如《君道》中记汤时大旱七年，于是使人祭祀山川，痛自贬责，结果祷告未毕就天降大雨。新儒学在天命与人事这两者之间比较重视和强调后者，这在《说苑》中也有所反映。卷一《君道》借殷太戊时卜者之口说：“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凡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

以上是对《说苑》编撰意图和思想内容的简略说明。这样的说明当然很不全面，可能也不准确，目的不过是给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一点参考线索而已。至于全书所包含的多方面丰富的内容，由于各卷卷首都有“题解”作介绍，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本书各卷中，作者的编撰意图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来体现的。新儒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具体发挥和形象论证。全书除第十六卷《谈丛》只是一些片言只语的语录之外，其余各卷的大多数篇章都首尾完具，有一定的情节，往往采取对话形式来展开故事，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刻画他们性格特征的某一侧面，使叙事颇见波澜。下面不妨举出两个例子来略加分析，以见一斑：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

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卷三《建本》)

这是全书所有故事中比较短小的一则，讲的是国君对待人民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表现。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敬德保民”、“民贵君轻”这些抽象的说教，在这里通过桓公与管仲的问答，通过管仲巧为设譬而具体化了，不仅生动形象，而且浅显明白。又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

师旷曰：“暮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者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卷三《建本》)

这是一则教导人们特别是居上位者要勤学的著名故事。它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旷》六篇的佚文，现在只见于本书，所以弥足珍贵。它同上面所引的故事一样，叙事形象具体，比喻巧妙贴切。其中关于少年壮年老年都应努力学习的一段话，已成为人们乐于引用的千古名言。

像这样出语警策、寓意深刻、说理透辟、篇幅短小的故事，全书中所在多有。读者展卷即知，无烦译注者饶舌。

关于《说苑》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作者的取材问题。对书中材料的真实性，从唐代刘知几起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故造异说，以惑后来”。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具体摘出了此书“时代先后邈不相及者”九条。清苏时学《爰山笔话》进一步指出全书时代违失处至一百零九条。应该承认，《说苑》一书在人物时代方面确有舛错，像相声所说“关公战秦琼”、“张飞斗岳飞”的情况不止一处两处，有时同一件事却发生在几个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这种情况

与此书的性质、成书过程、撰著体例都有关系，需作具体分析，而不应笼统地加以责难。第一、即使是正史，也不可能没有疏忽和舛误。《史记》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伟大著作，但《汉书》和《史通》都指出它在内容方面有不少互相矛盾处，金王若虚《史记辨惑》十一卷、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都是考订《史记》这类错误的专著。通史巨著《资治通鉴》问世之后，也有不少订讹纠缪的专著和文章。何况《说苑》只是一部杂著类编，至多只能算在稗官野史之列。第二、书中有些条目和正史的记载迥然不同。如《至公篇》说秦始皇曾一度想禅让天下，因鲍白令之的劝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反质篇》载秦始皇抓住方士侯生之后，允许他历数自己的过失，听后默然无言，居然释放了侯生。两条材料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相左，所以清人王谟认为这是全书中“尤可怪者”^②。但是对于这样的记载，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能轻率断定它不是事实，说不定它正好表现了秦始皇其人的另一侧面，恰可弥补正史的不足和偏颇。至于有的事实传闻异辞，编撰者兼收并蓄，这种处理办法也不是刘向首创，而是先秦诸子的发明，如《韩非子·说林》和《储说》中类似的情况就不少。对于后人来说，这倒是提供了一些可资选择和比较的材料。第三、为了说明某一问题，书中确有杜撰的事实或虚构的成分。但《说苑》一书既然是只就现成材料进行编纂加工的“述而不作”之作，“广陈虚事，多构伪辞”的罪名就不应算在编撰者的头上。再者这种情况也不自《说苑》始，先秦诸子里面的寓言同史实有时就难以分清，《国语》、《战国策》中有的故事如苏秦苦学发迹之类描绘得相当细致具体，很难说没有虚构夸饰的成分。屈守元先生认为《说苑》有些篇章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说话”形式，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变迁有一定的作用^③，这应是比较通达而切合实际的论断。

另须顺带说明的是，《说苑》与作者另一著作《新序》的性质完全相同，内容、体例十分接近，甚至具体篇章也有一些交叉重复，为什么要分为两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莫之能

详”。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两书进呈的时间是《新序》在前，《说苑》在后，中间相距七年^①。《新序》的分类和标目还比较粗疏，全书《杂事》占了五卷，另有《善谋》两卷、《刺奢》、《节士》、《义勇》各一卷，不仅分类不够明确，各类之间的篇幅比例也不大协调。这就使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断，即刘向面对丰富的原始材料，编成《新序》之后，感到一部书容量有限，言不足以尽意，而且体例上也有不足，于是又续编《说苑》，并在体例上作了重大改进。《说苑》二十卷不仅分类比较细致、明确，而且对各卷内容的轻重和次序的先后，看来编者都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所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效地体现编者的撰述目的。《说苑》这一体例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上承《吕氏春秋》、《韩非子》和《韩诗外传》而又加以发展，对后世同类著作很有启发。如《世说新语》分三十三门、唐刘肃《大唐新语》分三十类，清孙星衍、严可均编《孔子集语》，都曾参考《说苑》的分类体例。

《说苑》一书从汉至唐，各史艺文志均见著录，到宋初曾一度散佚。宋初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关于《说苑》情况的说明是：“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此后不久，曾巩校理皇家藏书，从士大夫家搜求到十五篇，经过补充整理，大体上恢复了原书旧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卷二十《反质》是曾巩析十九卷《修文》作上下两篇，以足二十篇之数。这在当时可能是实际情况。不过陆游《放翁题跋》卷二又引李德刍的话说：“馆中《说苑》二十卷，而阙《反质》一卷……后高丽进一卷，遂足。”可见后来传世的仍是足本。敦煌石室文献中有《说苑·反质篇》残卷，起自“秦始皇既兼天下”一则，迄至卷末，内容与今传本相同，仅文字小异。这是今传者为足本的一个有力佐证。

继北宋曾巩之后，整理刊刻《说苑》一书者代有其人。比较重要和通行的版本有北宋本、南宋咸淳本、明楚府本、明何良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四库全书本、万有文库所收杨以澐

校本。“诸本以明钞为最善”^⑩。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向宗鲁先生的遗著《说苑校证》。这是整理研究《说苑》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校对不精，颇有一些排印错误。根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性质、体例和要求，《说苑全译》的正文部分系以明钞本为底本，以《说苑校证》为主校本，以万有文库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印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校录而成。凡他本有误而底本不误的不出校；凡底本有误的，除了十分明显的情况外，一般也不改动正文，只是在注释中出校说明。为了方便读者检阅，还按卷次给每条正文编了序号。分条大多数情况依从底本，但于少数明显不合理的地方，也根据内容和前人成说有所调整，或一条析为数条，或数条并为一一条。

《说苑》与同时代的古籍相比，内容文字不算深奥，而且它受重视的程度也比不上当时的经书史籍，所以问世以来注者寥寥。据我们所知，元代以前未有注本。明代黄从诚有《说苑旁注评林》，那是一本评点式的著作，而且对正文作了删节，参考价值不大。近代日本学者关嘉著有《说苑纂注》一书，向宗鲁先生认为它“文理乖刺，事实疏舛”，“书中训义，率取之俗缪字书，动成创瘡”^⑪，并且我们限于条件，也无从搜求参考。据悉台湾商务印书馆近年曾印行卢元骏先生的《说苑今注今译》，我们也是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书^⑫。因此，本书的注释工作是在参考资料很少的情况下撰写的，加之译注者学识浅陋，错误可能不少。所幸的是，向宗鲁先生的大作虽名“校证”，但除了校订文字之外，对材料的出处、典章制度的变革、名物的由来、虚词实义的训诂，往往有精到的考证和阐释，给我们的注释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引述采摭之处不少。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

《说苑》一书在内容和文字方面也有一些不易解决的难点。例如有的人名地名只见于本书而不见于其他载籍，所以根本无从稽考；有的文句诸本均同而意义又确实难以讲通。凡此之类，注释中只好存疑；译文无法回避，则姑据一说或仅照原文字面译

出。翻译界前辈严复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是就汉语和外语的翻译而言，但对汉语的古今对译也是完全适用的。“雅”字不敢奢求，“信”“达”二字却是译注者努力的目标。不过这只是一种主观上的追求，究竟客观效果如何，只有留待读者诸君评鹭了。

王 鏊 1991.9.30

①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②用火炙烤竹简，使它出汗干透，可以防止朽蠹，称为“杀青”。

③《别录》今存《战国策叙录》等八篇。

④均见《汉书》本传及《艺文志》的著录。

⑤其中《列女传》一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是伪托。

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与今本及各史的记载不同，当误。或以为两《唐书》有可能将唐代刘勰的《续说苑》十卷一并计算，故为三十卷。

⑦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

⑧清人谭献语，见《复堂日记》卷六。

⑨“三纲”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三条基本原则，“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或步骤。

⑩参见本书附录中曾巩的《说苑目录序》。

⑪均见《汉书》本传。

⑫见万有文库本后附王谟跋。

⑬见《说苑校证序言》。

⑭宋本《说苑》和《新序》卷首都题有进呈的年份月日，《新序》为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二月癸卯，《说苑》为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三月己亥。进《说苑》时刘向已六十岁。

⑮同⑦。

⑯同⑦。

⑰近日获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的卢元骏先生此作，已在《全译》完稿并交付出版社初审之后了。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

- | | |
|------------|---------------|
| 1. 周易全译 | 14. 水经注全译 |
| 2. 今古文尚书全译 | 15. 大唐西域记全译 |
| 3. 诗经全译 | 16. 徐霞客游记全译 |
| 4. 左传全译 | 17. 史通全译 |
| 5. 四书全译 | 18. 文史通义全译 |
| 6. 资治通鉴全译 | 19. 荀子全译 |
| 7. 国语全译 | 20. 新序全译·说苑全译 |
| 8. 战国策全译 | 21. 孙子全译 |
| 9. 贞观政要全译 | 22. 论衡全译 |
| 10. 晏子春秋全译 | 23. 尉繚子全译 |
| 11. 吴越春秋全译 | 24. 管子全译 |
| 12. 越绝书全译 | 25. 商君书全译 |
| 13. 唐才子传全译 | 26. 韩非子全译 |